

人之為人的追問與守望

The Inquiry and Watchfulness into the Nature of Being Human

賀 苗 徐李波

He Miao and Xu Libo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Neuroessentialism and the Dilemma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Professor Xu Xiangdong transcends conventional ethical critiques centred on freedom, autonomy, and justice, as well as practical debates concerning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human enhancement trend, he reframes the discourse on moral bioenhancement through a critique of neuro-essentialism. Rather than focusing solely on whether moral bioenhancement technology is feasible or desirable, Professor Xu elevates the discussion to a more fundamental philosophical inquiry: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賀 苗，哈爾濱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哈爾濱，郵編：150081。
He Miao, Professor,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150081.
徐李波，哈爾濱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中國哈爾濱，郵編：150081。
Xu Libo, Master Studen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150081.

《中外醫學哲學》XXIII:2 (2025年)：頁 61–6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2025), pp. 61–64.

近年來，隨著在神經科學、認知科學、人工智慧等相關技術的發展，道德生物增強（moral bioenhancement, MBE）因其直接通過技術手段干預並提升人的道德行為而備受矚目，同時也引發廣泛爭議。徐向東教授《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一文並未停留在關於自由、自主性或公平的常規倫理批評，也沒有拘泥於技術風險與制度規制層面的利弊權衡，而是在全球“人類增強”的浪潮中，以神經本質主義批判為切入點，對 MBE 倡議進行深刻而徹底的反思，將問題提升至“人之為人”的本體論與實踐論層面加以討論。

一、人之為人的追問

文章廣泛而審慎地援引了神經科學、進化心理學、認知科學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效反駁了 MBE 宣導者所依賴的早期樂觀證據，揭示其通過局部、情境性的實驗結果以提升人類總體性道德能力的宏大圖景存在明顯缺陷。作者明確指出，MBE 倡議者試圖借助藥物、基因編輯或腦刺激等手段實現道德增強的做法過於簡單化，帶有強烈的技術主義與自然化傾向，根本無法為人類許諾一個美好的未來。繼而，文章對神經本質主義的人性假設展開了系統追問，全面動搖了 MBE 的理論基礎。所謂“我們只不過就是自己的大腦”，意味著人格同一性、自主性與責任能力可以被還原為可定位、可測量、可操控的神經機制組合，仿佛只要調控相應通路，即可穩定提升共情和利他等道德品質。

文中以“成癮”為例生動地展示了將複雜的社會心理現象簡化為腦部疾病的局限與潛在危害。固然，腦部疾病模型揭示了神經基礎的重要性，卻難以解釋生活史、關係網絡與社會制度在成癮發生與康復中的決定性作用。當人們將成癮全然視為腦部疾病時，個體責任、社會因素及在生活世界中的意義追尋統統被邊緣化，最終留下的是一個被大腦完全接管的“空心人”。因此，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神經本質主義的根本錯誤在於它無視一個基

本事實，即“人類心靈本身是由大腦的神經系統、身體和環境構成的完整系統”，將人完全收縮為大腦，不僅在經驗上難以成立，在規範上也削弱了人的敘事性與關係性維度。

通過層層追問，文章將道德生物增強從“技術是否可行？是否可欲？”的規範問題，上升為人工智慧時代“人類究竟何以存在”的人學問題，觸及了現代技術文明的核心範疇。

二、人之為人的守望

在揭示神經本質主義的理論限度之後，文章並未止於批判，而是在身體、文化與生活世界三維向度上進一步展開人之為人的理想圖景，呈現出人性的尊嚴與溫度。

作者借助 4E 認知理論強調，人的心靈活動並非是封閉於頭腦中的計算，而是大腦—身體—環境相互作用、不斷生成的結果。對此筆者深表贊同，我們人類的幸福、同情與愛等道德情感首先是通過身體本身的感受呈現出來的，而患者在病痛、脆弱甚至是瀕死狀態中的尊嚴訴求也只能在具身的情境中被理解。生命倫理學作為醫學人文的骨幹學科，始終將增進人類福祉作為最高的倫理原則，因此要打破對技術的迷思，必須守望具身的人的主體性，而不是將身體簡單視作藥物或電刺激的載體，更不能將人類道德進步還原為個體大腦的技術管控。

道德生活並非一組可通過神經技術一次性寫入的固定程式，而是在不確定性、衝突與時間開放性中不斷生成的實踐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者特別凸顯了文化進化在確立道德規範、塑造集體意向性和聯合能動性中的核心作用。人的生物本性、文化本性和道德本性之間存在著動態的、複雜的互動關係。人類道德的真正飛躍，不是單純生物進化的結果，而是與文化進化密切關聯，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生活世界的土壤中扎根。若在未充分反思的前提下，以抽象的“道德增強”名義推行強制或半強制的神經干預，既可能壓制不同文明對善與正義的多元理解，也可能在不

同文化情境中造成新的壓迫與不公。因此，值得關注的不是 MBE “如何讓人更聽話”，而是如何面對現代性自身製造的系統性風險？MBE 是否會侵蝕道德主體性的形成空間，壓縮個體通過實踐而成為自己的過程？文章提示我們，生命倫理學應堅守的核心不是效率最大化，而是倫理生活形態的多樣性與開放性，要始終保持個體在衝突與不確定性中逐漸形成屬於自我的道德空間。

略有些遺憾的是，文章結尾將儒家倫理資源引入這場當代前沿的科技倫理辯論，但尚未展開深入挖掘。在中國語境下，儒家的修身傳統與德性倫理始終強調“在關係中成人”，將道德理解為持續的自我修養與共同體實踐，而非一次性設定的行為程式，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具潛力的理論增長點，值得未來進一步探討。

總而言之，徐向東教授這篇論文是對道德生物增強思潮的一次深刻而有力的哲學反思。作者成功地將學術視野從“是否應該”的層面，推進到了“是否可能”以及“何種意義上可能”的更根本層面，對於深化與拓展當代生命倫理學的社會批判維度具有重要價值。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對 MBE 的技術批判，毋寧說是人工智慧時代對人之為人的系統追問與審慎守望。在數位技術、演算法治理、人工智慧日益深度融合進道德判斷場域的當下，這份追問與守望或許是哲學對人類文明最珍貴的饋贈。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徐向東：〈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中外醫學哲學》，2025 年，第 23 卷，第 2 期：頁 7-34。Xu, Xiangdong. 2025. “Neuroessentialism and the Dilemma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7-34.